



汉语词源通史

杨端志 主编
蒋莹 著

◎ 东汉卷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YY004)优秀结项成果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汉语词源通史

杨端志 主编
蒋莹 著

◇ 东汉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通史·东汉卷 / 杨端志主编; 蒋莹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3.5

ISBN 978-7-5500-3591-1

I. ①汉… II. ①杨… ②蒋… III. ①古汉语-词汇-汉语史-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4707号

汉语词汇通史·东汉卷

HANYU CIHUI TONGSHI · DONGHAN JUAN

杨端志 主编

蒋莹 著

出版人 陈波
项目统筹 胡明
策划编辑 周振明 童子乐
责任编辑 童子乐 项玥鸽
书名题签 郑训佐
书籍设计 方方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二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5.5
版次 202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2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7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3591-1
定价 4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23-1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主 编 简 介

杨端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科点学术带头人，山东省汉语言文字学强化重点建设学科学术带头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985工程“汉语与汉语应用研究”项目负责人。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通信评委，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通信评委，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委，山东省外国语学会符号学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等。出版专著《训诂学》《文言文基础知识》《汉语史论集》等20部（含合著），发表论文《周易古经韵考韵读》《论词义与词的区别》《试论确定汉语词的原则》《“误读”与新义》等7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词汇通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周易》语言学研究”等19项。曾获省部级等各类奖项20余个，其中《训诂学》获多个奖项的一等奖。

总序

在汉语研究的几个主要部门——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研究的困难最多；在汉语的主要研究方法——共时研究、历时研究中，历时研究的困难最多。我们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多很多，而且，有些困难远非我们一时能够克服的。我们的《汉语词汇通史》只是一种尝试，先后有三十几位硕士、博士、博士后参加，历时二十五年。如今，我们的《汉语词汇通史》终于要陆续出版了，有很多问题需要向大家交代。我们想要说明的有：我们对“汉语词汇通史”的思考，汉语词汇通史的语料，关于已有汉语史的分期，我们对汉语词汇史的分期，汉语词汇史的根基——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概览，汉语“词”“词汇”“词汇史”研究中的难题，汉语词汇史研究必须接受“小学”研究的成果，汉语词汇的共时研究与共时研究方法，汉语词汇历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方法，关于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等等。可惜，时不我与，这里只能谈谈最必要的几个要点了。

一、《汉语词汇通史》是我长期思考、研究的一个课题

随着学习、工作的变迁，我先是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语法、词汇上，后来又放在训诂学（更确切地说应当是“小学”）上。因此，我的教学，研究，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内容便或者是词汇学、词汇史，或者是训诂、文字、音韵之学，切换来切换去，或者是几者融合。《汉语词汇通史》便是我和我的同道走融合研究道路的初步结果。

长期以来，词汇史研究的许多疑难问题一直在我们头脑中萦绕着。例如，

汉语通史研究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研究所需要的语料是不同的，词汇通史研究需要的语料最多最复杂，几乎是全部文献。流行的研究路径是自专书词汇始，由上古一部一部的专书词汇研究下来，词汇通史就出现了。这样的研究路径符合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吗？是历史词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吗？有可操作性吗？又例如，汉语史里的语音史，可以由声母、韵母、声调构成共时系统，从上古一直推到当代，或者从当代一直推到上古，从而构建一个具有严密规律的历时语音系统。语法史可以由若干词类、若干句式、若干虚词构成共时系统，从上古一直推到当代，或从当代一直推到上古，从而构建出一个具有严密规律的历时语法系统。语音史、语法史都有很强的规律性、系统性。那么，汉语词汇史有没有像语音史、语法史那样的规律性、系统性？能不能像语音史、语法史那样，首先研究出一个由若干成分构成的共时系统，再由这个若干成分构成的共时系统串联成一个具有严密规律性的历时系统？再例如，在汉语发展史上，语音最稳定，语法次之，词汇则是处于每时每刻的变化中。那么，语音通史、语法通史、词汇通史的分期一定是不同的。词汇通史的时段，比语音通史、语法通史要短得多。那么，词汇通史的分期标准是什么？要分多少个时期？另外，在汉语词汇通史中，各时期的格局怎样？重点在哪里？各时期之间如何贯通？各时期怎样描写？怎样解释？……

带着问题意识，我们开始探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我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先后做了断代的商代甲骨文词汇词义、西周金文词汇词义研究等，做了断代专题的中古名词、中古动词、中古形容词研究等，做了专书《周易》经传词汇词义研究、《尚书》词汇词义研究、《国语》词汇词义研究、《晏子春秋》词汇词义研究、《礼记》词汇词义研究、中古小说词汇词义研究，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词汇词义研究，还做了部分佛典专书词汇词义研究。

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对于研究本体都有一定的价值，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对我们想要寻找像语音史、语法史那样的规律性、系统性有所启发，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与我们提出的问题也相距很远。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零散的、离散的，只是分散于专书、专题、专类中的少部分词汇，无法窥见汉语词汇的全貌。尤其是，想通过这样的途径来研究汉语词汇通

史，希望是渺茫的。

本着总结的目的，我们也环顾了当时语言学界的专书词汇研究，认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有典型意义的专书进行研究，以总结一部专书词汇的基本面貌；第二个层次是对某一时段的若干部有典型意义的专书进行研究，以总结某一时段词汇的基本面貌；第三个层次是把各个时段联系起来，形成汉语词汇发展演变史。周祖谟先生曾经具体描绘过这个研究步骤：“要研究词汇的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做为出发点。犹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①

周先生的描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对《诗经》韵部的研究谈何容易，从南宋吴棫到清人段玉裁几乎用了七百年！再说，词汇与韵部不同，词汇要比韵部复杂得多，词汇研究要比韵部研究困难得多。《诗经》的韵部，可以通过系联韵脚、归纳韵例，再佐以汉字谐声“同声必同部”两大步而得其韵类。而一部专书的词汇面貌，到底包括了多少部类？或者倒过来说，多少部类才能反映一部专书的词汇面貌？并且，我们怎么用这些部类捋出一个断代汉语词汇史，从上古汉语一直捋到现代汉语，从而捋出一个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基本面貌？

专书词汇研究是在1983年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上由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前辈提出来的，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专书词汇研究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有老一辈语言学家，也有堪称中流砥柱的中年学者，更有大量的语言学界的新秀——硕士、博士研究生。这四十年中的研究，几乎涉及各个历史时代典型的专书。专书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几乎涉及各种常见专题。专书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专题者有之，专书副词、介词、连词等虚词专题者也有之；专书核心词者有之，专书方言词者也有之；专书单音节词汇者有之，专书双音节词汇者也有之；专书同义词者有之，专书反义词者也有之；专书联合结构者有之，专书偏正结构者也有之；专书成语者有之，专书熟语者也有之。全面研究一部专书词汇者也有之。在全面研究一部专

^① 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序言第2页。

书词汇者当中，有几类最值得称道：有的首先对专书进行校勘、注释，编出词典，再进行专书的词汇学研究、词类研究；有的首先广泛收集专书历代训诂，编出专书词典，再进行专书词汇的研究；有的对专书先进行注释，再进行有效的专题研究；有的收集同一时代多种专书词汇，再进行断代史的全面研究。这些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典范性。这些专书词汇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格局，丰富了汉语词汇史的内容，也为词汇史研究提出了方法。

我们认为，对专书词汇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影响专书词汇研究质量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一部专书的词汇面貌，到底应当包括多少部类？哪些部类是专书必有的，哪些部类是为捋出一个断代汉语词汇史而专书词汇研究所必有的？哪些部类为能够捋出从上古汉语一直到现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基本面貌而专书词汇研究所必有的？现有研究突出的问题是部类设立随意性较大，无法全面反映专书特有词汇结构。

第二，专书词汇研究是为断代词汇史、词汇通史服务的，专书词汇研究怎样才能体现出“史”的一面？对本专书词汇的描写，要放到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去描写。一部专书的词汇，对它之前的词汇有所继承，这部分承古词要描写出来。有本专书所用的新词，要把新词描写出来。有本专书对旧词的新用法，新用法要描写出来。本专书词汇对后世会有影响，要把对后世的影响写出来。这样才能反映本专书的历史地位。现有研究突出的问题是套用现有的断代词汇理论框架，把专书词汇研究写成了一部一部断代词汇学，割裂了专书词汇的历史联系，无法反映专书词汇特有的时代性、社会性。

第三，对写到的某部类，现有研究只是把词摆出来，深入描写、解释不够，总结汉语特有的规律少，提炼汉语特有的词汇理论少。由于种种原因，文风显得仓促、急就、浮躁。

第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专书词汇研究方法的交代中，大多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一说，这是很好的，尤其是“定量”。由于专书是封闭语料，“定量”是能做到的，对于很多部类的词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定量”往往不准确。专书词汇研究还说到“比较方法”。专书词汇研究的比较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共时原则，即跟同时代的著作比，这是通过比

较来探讨本专书词汇的特点；二是时间相近原则，即跟与本专书时间最接近的著作比，这是通过比较探讨专书词汇的直接的继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比较的对象往往时间跨度很长，根本不存在继承与发展关系。专书词汇研究还往往会谈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对某些部类的词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合理的描写方法，譬如对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的分析与这些词的发展。

第五，专书词汇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往往在词汇学之外。其首先需要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方面的知识，其次是需要文献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再次是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方面的知识。用句解释学的话说，就是需要将专书词汇现象与这些知识相融合。而这些，在教育的学科体制上早已留下遗憾。

我们相信，专书词汇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的看法，也是词汇学界大多同人已看到的和所认同的。

想通过若干部专书的词汇研究汇合形成汉语词汇通史，看来是困难的。

有的文献学家说，中国古代文献总数在8万种以上^①；有的文献学家说，其实中国古代文献总数比之应该更多，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列出的清人所撰文献就有22万种以上。专书即使只有8万种，假若每年研究100种，需要八百年才能写出词汇通史。以现有的研究人力，事实上每年只能研究十几种。这样的话，汉语词汇通史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出现！

看来，有关全局性的词汇规律、词汇体系，只根据部分专书的语料，只研究部分专书的词汇，是无法下断语的。在每一个共时层面上，我们必须研究更多代表这个时代的专书；在词汇通史层面上，我们就更有必要研究更多的、能代表全部词汇史的语料。唯有如此，对于断代的、通史的词汇的规律性、体系性，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但是，研究更多的文献，研究更长的时段乃至通史，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盼望着出现适合的资料——大型工具书。

^①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5页。

1993年年底，我们盼望已久的12册的《汉语大词典》全部面世了。《汉语大词典》“经过千余人18年的艰苦奋斗”（罗竹风语），使用“一万多种最重要的图书典籍”（阮锦荣语），包括“经书、史书、子书、总集、别集、诗文评·书画论、古代小说·笔记·杂著、通俗小说、古代戏曲、变文·诸宫调·散曲·时调、地理、科学技术、医学文献、宗教、古代字书·词书·韵书、古籍考释、出土帛书竹简、类书·政书、资料汇编、近人学术专著、现代著作等21个大类”^①。从语料看，《汉语大词典》已相当充分，相当完备。可以说，这是倾当时全国学界之力完成的。

《汉语大词典》本身就是对这一万多种专书进行词汇研究的成果。《汉语大词典》编纂者对这一万多种专书逐词做卡片，并从现代词汇学角度对卡片反复筛选（1977年，我参加过山东大学《汉语大词典》组对专书卡片核对原著、筛选立目的工作，领了三小推车卡片，码了办公桌那么高，工作十分辛苦），最终提炼出单字词2.3万余条，复音词34.6万余条，总词汇量达37万余条，总义项量达51.6万余个，这应当是最接近汉语词汇、词义总数的成果。这也是倾当时全国学界之力取得的。

《汉语大词典》研究词汇是遵照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原则，记录一个词的意义发展历程。我们的汉语词汇通史研究是按照词汇发展的原则，划出共时词汇系统，研究词汇内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探寻规律，提炼理论，进而统率历时词汇系统，与《汉语大词典》研究的目标不同、方法不同。但是，《汉语大词典》的立目、注音、释义、书证、体例，为我们提供了汉语词汇共时系统、历时系统、词汇内部结构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利用《汉语大词典》，我们可以研究汉语词汇历史上的共时系统与汉语词汇通史的历时系统的基本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和基本规律，可以研究汉语词汇的多种共时系统、多种历时系统和发展演变。这使得《汉语大词典》不仅是检查个别词个别义的大型工具，而且成为研究多种共时、多种历时、多方面的汉语词汇、汉语词汇史的大型工具。

^① 郭忠新：《锲而不舍 终必有成——记傅元恺》，载《上海出版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汉语大词典》可以视为汉语历史词汇的总库，《汉语大词典》的出版，为从总体上研究汉语词汇、汉语词汇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经过几年的准备，1998年，我们开始以《汉语大词典》为语料，申报教育部社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3—2009年，我们用七年时间建立了《汉语大词典》语料库^①、汉语词汇通史补充语料库（见后文）。2010年，我们同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两者同时都得到批准。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词汇通史研究”以优秀等级结项。至今，我们这一研究已经二十五年了，先后有30多个硕士生、博士生参加，各卷皆由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完成，如今这些作者大多是高校教师，成为大学教授、副教授，也有人担任杂志总编、学院院长等。

《汉语词汇通史》是我们长期思考、研究的成果。

二、《汉语词汇通史》对《汉语大词典》语料的补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②

对于汉语词汇通史研究，语料的充足、准确是研究的基本依据，是结论可靠、科学的基本保障。

为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谈一谈汉语语料的历史。

汉语词汇通史研究涉及的语料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口语形式，二是书面语形式，三是文学语言形式。这三种语言形式是分层次的：口语是根本；书面语是语言在口语基础上，经过文字记录时或多或少的加工形成的；文学语言是语言在书面语的基础上，经过文字、词汇、语法、语音的规范形成的。

口语形式、书面语形式、文学语言形式在语言史上出现的时间差距很大。口语形式出现得最早，它的发展历史也最长，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

^① 详见杨端志：《〈汉语大词典〉对汉语词汇发展演变史的价值与研究方法——〈汉语大词典〉词汇发展演变史研究条例》，载《汉语史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2—328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的。书面语一般认为是出现于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万年，而文学语言形式则一般出现在文字记录长篇的语言之后。

（一）汉语的口语

口语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历代口语是历代书面语、历代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口语以语音为承载工具，是靠说和听来实现交际。

1. 史前口语

汉语口语的历史，是跟中华大地上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相联系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多元的人类文化经过千万次的交流、千万次的融合的结果。

我们现在说话所用的口语，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类、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直立人（晚期猿人）语言、古人（早期智人）语言、新人（晚期智人）语言的进程，经过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氏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部落联盟、不同的民族千万次的交流、千万次的融合而形成的，是由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创造的。

关于早期人类的语言，我们深信劳动创造了语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机体其余部分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①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据考古学家统计，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遗址超过2000处，遍布全国。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经历了直立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

直立人，又称晚期猿人，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至十万年前。公认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郧西人、和县人等。

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十万年至四万年前。有代表性的如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金牛山人、长阳人、巢县人、马坝人等。

新人，又称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约四万年至一万年前。主要的有山顶洞人、峙峪人、河套人、安图人、哈尔滨人、柳江人、兴义人、丽江人、左镇人等。^①

按照恩格斯的原始人类与语言的关系的说法，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已经进入会说话的时代。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章“中国历史的开端”曾描写到北京人说话的历史：

北京人的脑髓已经远比现代猿类大而完善，脑量平均约为1059毫升，比现代猿类的平均脑量415毫升大一倍半以上。在六个比较完整的头骨中，最大脑量为1225毫升，已接近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毫升。他们脑部结构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更是现代猿类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在长期的体质形成过程中右手比左手更多地使用，大脑的左边也比右边略大一些。从脑子的发展程度来看，他们已经有了语言。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②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早期的人类，经历了漫漫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度过了悠久的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时期，其发音

^①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器官、思维能力也在劳动和说话中得到改造与发展。对于古人说话的具体情况和说话的性质，我们已无从知道了。我们推想，语音一定是音节分明的，音义一定是结合的，表义一定是从一个一个的概念开始的，概念的组合一定是由短到长发展的。换句话说，早期人类的语言一定是语音、词汇、语法三者兼备的，词汇一定是接受语法支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所说的“词”，如果将来考古有所发现、有条件的话，可以上溯到我们的祖先诞生的时代。

2. 华夏语

恩格斯说，人类的发展，“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①。语言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可见，语言在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根据我国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古文字，我们认为，以单音节词根占绝大多数、单音节词根大多可以自由运用、以主—谓—宾为基本语序、由一定量虚词为语法调节、有声调、现代语言学分类中被称为“词根语”的汉语（为称说方便，下面称为“词根语”的汉语或词根语汉语），早期被称为华夏语，产生的时代也应当相当早。

“词根语”的汉语的口语，是在原始口语的基础上又经历了一个漫长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多元的人类文化又经过千万次的交流、千万次的融合的结果。我们推想，“词根语”的汉语，形成于晚期智人后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后期，距今有一两万年。我们的祖先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词根语”后，大约距今八千年前，产生了反映“词根语”的原始汉字。原始汉字肯定是为“词根语”汉语口语而造，先是为记住口语中某个概念或某些概念而造，记录概念的汉字多到能记录线性的复杂概念，即一组合概念、语言中的一个词组，甚至一个短句时，才产生为词组中或者句中的某个概念、某种关系而造。汉字是在适应汉语口语中的概念、组合概念、短句、长句甚至篇章的需要中逐渐产生的。为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汉字的产生过程最初是非常缓慢的，随着字数的增多以及记录语言的能力加强，造字的速度逐渐加快。商代甲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

甲骨文文献、西周金文文献中，假借字还很多。直到不用假借字的时候，汉字的数量才算大致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从被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来说，最早的汉字记录的是概念与意义，也就是口语中的词。反过来也证明，原始汉字记录的汉语是“词根语”。“词根语”的汉语被原始汉字记录之前，应当有一个悠久的无文字记载时期。同时，我们认为，“词根语”的汉语在被汉字记录之前，已经成为语素、词、词组、句子完备的严密的汉语语言系统。

最早产生的原始汉字记录的汉语的单位是概念，是意义，是口语中的词，这是汉语书面语词汇史的开端。

关于这个问题，李运富教授提出的汉字的“形、意、用”新三要素观念和“字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有力的解释。

李运富教授认为：汉字有“形、意、用”三要素，“形”是汉字成立的前提，是视觉感受到的直接印象。“意”指的是汉字的“构意”，它直接来源于对客观事物（包括抽象概念）和语言音义的认识，是体现在汉字内部结构上的构形理据。“意”在汉字的初创时期具有普遍性。“用”指的是汉字的功用和职能，汉字既可以只记录语言的意义信息，由“形”“意”结合直接表示客观事物或某个约定的内容（如初始状态的“图形字”“徽标字”，后来的方言字、训读字），也可以记录语言的表达单位，包括语音单位和音义的结合体。字形构意跟语言音义的联系并不一致。“汉字的产生也得一个一个地造，而且造字者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针对某个词组或某个句子里的所有词来造字……人们首先为语言中最重要的一些词语造字，这些字虽然还不能‘成组成句’地记录语言，但能反映交际中人们最关心的一些概念和意义……因此根据语言的某些意义单位（基本词义）或交流所需的某类信息（基本概念）来造字，这些被最初造出来的字就是汉字系统的源头字。”^①

李运富教授的汉字“三要素”是一个对汉字系统的新认识，最具实践价值的是字“用”理论，为汉字提出了新范围，把汉字的产生时代提前了数千年，为汉字产生以后的复杂变化提供了新理据，对关于汉字与词语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

^①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2页。

根据李运富教授和有关学者的研究，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岩画中有1500多个抽象符号，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有16个刻画符号，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有10多种彩绘符号，距今七千三百年左右的安徽蚌埠双墩文化遗址中有600多个刻画符号，可确定的有“云”“人”“它”“鱼”“鹿”“网”“阜”“刺”等字……这些符号，“简直跟甲骨文没有什么差别了”。^①

自此，作为“词根语”的汉语有了文字，有了书面语的词语，或者说，有了词语的书面语。这些书面语的词语是很简单的，但在此基础上，汉字逐渐记录词组，记录句子，记录篇章。至《尚书》的《虞书》《夏书》，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汉语一步一步走向完善的书面语时代。

而汉语的口语又受到书面语的影响，词汇则由于汉字的记录而逐渐巩固，逐渐丰富多彩；语法则由于汉字的记录而语序固定，句式加长，产生虚词，语义含量增加，更富多样化；语音则逐渐产生标准音，趋于统一，趋于系统化。

华夏语的口语，即汉语的口语继续沿着“词根语”的方向发展着、丰富着。

（二）汉语的书面语

书面语是文字产生以后，以口语为基础，由文字记录的语言，是第二性的。口语是第一性的，它是以声音运载的音、义符号系统，依靠说和听实现交际。书面语是以文字笔迹形成的字形为运载工具的形、音、义符号系统，依靠书写和阅读来实现交际。有文字记录的语言，都存在这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样貌很不一样。汉语的书面语样貌跟文献学有关，即陆宗达先生、王宁先生所说的“文献语言”，近似于华学诚教授、张猛教授所说的“文献语言”，即“文字记载的古代文献”的语言。^②

汉语书面语从什么时代开始呢？因为词汇一定是接受语法支配的，我们还是从词汇开始的时代来谈。

关于母系时代的词语，《尔雅》中有母系氏族时期的词语。如：

《尔雅·释亲》“母党”：“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之男子为从母舅弟，

①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7页。

② 华学诚、张猛：《“文献语言学”学科论纲》，载《文献语言学》（第四辑），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9页。

其女子子为从母姊妹。”

其中的“从母”“从母舅弟”“从母姊妹”为母系氏族时代的词语。

《尔雅·释亲》“妻党”：“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舅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舅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

其中“甥”“出”“侄”“离孙”“归孙”等，都是母系氏族时代的词汇。

又：“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谓夫之庶母为少姑。”

其中“舅”“姑”“君舅”“君姑”“先舅”“先姑”“少姑”等，也都是母系氏族时代的词汇。

我们说这些词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词汇，是因为这些称谓词都是以母亲这一方为基点来为各种关系的人命名的。

由于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对这些词语的内涵、外延是清楚的，使用也不会出差错，所以《尔雅》中的这些解释语言也应当是母系氏族时代的。

王力先生曾经从语言的社会性出发，探讨过原始社会的词汇、渔猎时代的词汇、农牧时代的词汇、奴隶社会的词汇。

王力先生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的产生远在文字之前”，“依理推测，汉语的基本词汇，绝大部分应该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存在了”。关于原始社会的词汇，如“日、月、风、云、雨、虹、蜃、雪”等天文气象词汇对应的概念，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甚至日、夕、晴、雨的概念，也早已有了”。人称代词“余、朕、我”“女、乃”原始社会也有了。渔猎时代的动词有“渔、田、狩、逐、从、获”，狩猎的对象有“鹿、麋、麇、狐、兕、豕、兔、雉、虎、象”等。农牧时代的词汇有农作物词汇“禾、黍、稷、秬”，农具词汇有“耒、耜、耨”，耕作词汇有“耜”，收获词汇有“蓄”，谷熟叫作“年”，收获后尝新之礼叫作“登”等。^①

《尔雅》和王力《汉语词汇史》记录的早期词汇是零散的，大规模的汉语书面语语料还需要在大规模的汉语书面语文献出现之后进行收集。周革殷命

^① 王力：《汉语词汇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页。